

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浅论

戴本博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公元前384—322)是西方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他除了在哲学上为人类作出卓越的贡献外,并且深入研究了许多专门学科,成为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逻辑学、生物学等等学科的奠基人。他在教育哲学方面继承并发展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思想,进一步推动了教育理论的发展。

一、教育与政治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上表现了奴隶主的偏见,认为奴隶制的存在是符合自然的,是有益的。由一两个或少数贤明的德才兼备的优秀人物治理国家是最理想的。穷人占优势的国家容易出现民主政体,富人占优势则易产生寡头政治。民主制比较符合民主和平等的原则,但其缺点是易受少数操纵,作出错误决定,或过多地侵犯富人利益,因而加剧贫富之间的矛盾,更有甚者则是民主过分,以至酿成大乱,使邦国崩溃。理想的国家应采取共和制的形式,在这里自由民轮流统治;大家都是自由民因而是平等的,大家既做统治者,又做被统治者;权力的划分以年龄为准,青年人当军人,担负保卫国家的任务;中年人负责国家的政务和司法;老人则专门从事奉侍神明的活动。从阶级上看,理想的国家应是奴隶主中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因为奴隶主中产阶级最能体现正义和智慧,太富的人既不愿意也不服从政府的法令,太穷的人又“太下贱了”。“一个阶级不能服从,只能专横地统治,另一个阶级不懂得如何指挥,必须像奴隶一样受统治。”而中产阶级是国家最安分守己的阶级,他们不觊觎别人的东西,别人也不觊觎他们的东西;他们不害别人,也不被人害。中产阶级也最适于做国家的指挥者,那些最好的立法者差不多都出自中产阶级,如雅典的梭伦和斯巴达的莱库士等等。

政治的优劣不仅取决于组成城邦的阶级以及政体的形式,而且取决于城邦是否具有美德。城邦的善,取决于组成城邦的人的善。优美的城邦,应该人人都是善人。亚里士多德考察了人之成为善人的原因。他举出:“人们所由入德成善者出于三端。”这三端是,出生所禀的天赋,以后养成的习惯,人的“内在的”理性。所谓天赋,这里是指民族精神、民族性格。一个民族的天赋的品质是可以改变的,他说:“积习变更天赋;人生的某些品质及其成长、日夕熏染,或习于向善,或惯常从恶。”习惯和理性则全属于知识和意志的范围,是有赖于教育去实现的。因此教育应成为国家最重要的事业,“邦国如果忽视教育,其政治必将毁损。”所以国家的执政者必须认真制订教育方针,并且把教育作为公共要务。亚里士多德推崇斯巴达把教育作为最大事业的政策,他们在教育

上所花的精力和用心之深为古代各国所不多见的。

国家的目的是使国家成为富强的国家，使人民成为幸福的人民。要实现这一根本目的，除应有好的政体外，就是依靠教育的杠杆，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善人”。公民与国家的利害一致，目标一致。人的生活有勤劳与闲暇之分，有战争与和平之分；事业上有必要和实用的作业，也有纯理性活动的作业。在人生方面，勤劳的目的是为了闲暇，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在事业方面，必要的和实用的作业是获得沉思活动的手段。根据以上原理，教育应该是：第一，要顾及灵魂的各部分，并着重于灵魂的较高较优越的部分；第二，必须顾到人的生活各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有分别地加以对待。因此，既要使公民们具有道德上的美德，也要使其具有智慧上的美德，既要使其具有勤劳和作战的能力，更要使其善于过闲暇与和平的生活；既要使其能够完成各种政治的、军事的以及日常必需的事务，更要使其擅长于追求真理、研究事物的原因和原理，爱好理论。这是制订教育方针时应依据的原理以及所应达到的目标。

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一样，总结了历史经验，把教育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在他们所写的政治理论著作中，都是把教育当作实现理想政治的工具，这说明他们是极有政治远见的思想家。经验证明，任何一个不要教育或鄙视教育的国家，都是短命的。不要文化，鄙视知识，摧残教育的国家，是没有任何前途的。

二、心理学与教育阶段论

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但他又认为形式是主动的，是本质，质料是被动的，因此他又在另一种形式下，把形式与质料分割开，并从中引出纯形式；并且认为所有事物都有它所追求的目的，形式就是其目的，因此他的哲学又走向了神秘主义，走向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神学目的论。

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是以上述哲学为其理论基础的。他说，一切有机体都是由质料和形式构成。有机体的躯体是质料，有机体的灵魂是形式。灵魂是有机体的运动的原因和实质，是其现实和真正的存在。躯体是有机体的工具，灵魂是有机体的目的。凡有生命的地方就有灵魂。灵魂是统一的实体，但它有多种不同的功能；各种不同等级的功能与生命的各种形式相适应。因而“要按三个方面来规定灵魂，即营养的灵魂、感觉的灵魂和理性的（思维的）灵魂，相应于植物的、动物的和人的生命。营养的灵魂，当单独存在时，是属于植物的，——植物性的灵魂；如果说它同时还能感觉，就是动物的灵魂；如果既是营养的，又是感觉的，并且也是理性的，那就是人的灵魂。”^①

他认为，灵魂如同一块空无所有的白板，它是感觉的接受器。感觉是灵魂感知外界事物的一种能力，灵魂借助于感觉器官而感知外界事物。人的认识来源于感觉，而“那引起感觉的东西是外在的……要感觉，就必须有被感觉的东西。”列宁说：“这里的关键是‘外在’——在人之外，不以人为转移。这就是唯物主义论。”列宁认为亚里士多德“紧紧地接近唯物主义。”^②

感觉在人的认识中虽不可少，但是通过感觉只能认识个别，不能认识事物的普遍、一般。“我们不以官能的感觉为智慧；当然这些给我们以个别事物的最主要认识。但感

官并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事物所以然之故——例如火何为而热；他们只说火是热的。”^③因此，在认识中，最重要的还在于通过思维活动，深入到对象的本质中去，以便了解对象的普遍、一般。但是，他错误地认为思维可以不依赖于感觉，心灵可以通过直觉直接发现概念，它并不依赖感觉所提供的材料。感觉在这里仅能起到一种诱因作用，通过感觉的诱发，人们的思维便能发现概念、原理。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又一次陷入了与柏拉图相类似的片面性。他夸大了理性的作用，贬低感性认识，把感觉只看作是引起思维活动的刺激，理性可以不要感性认识，而凭空地产生概念、原理。他甚至重复柏拉图的灵魂不死的神秘主义论调，说灵魂的理性部分是不死的，它永恒地存在着。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心理学是他的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与柏拉图一样，在教育上，他非常强调纯思维活动在培养心智方面占据压倒一切的地位。同时由于其哲学、心理学的现实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因素，对感觉、实践、情感在人的认识和人们的心灵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重视，因此，在教育上，他看重练习在学习中所起的作用，看重实践在道德教育中的意义。他十分重视对人的生理的研究，提出应根据儿童的生理发展划分年龄阶段，依据年龄阶段而制订出不同阶段的教育任务。

人包括躯体和灵魂两部分，而灵魂又包涵非理性与理性。按人的生长进程，先是躯体，然后是非理性灵魂，最后才是理性灵魂。人在婴儿时就开始显露出情感和欲望，婴儿的啼与笑，高兴与愤怒，就是他们的非理性灵魂开始发展的标志；而人的理性的灵魂，则要到以后的岁月，经过教育，才能逐渐得到发展和完善。合理的教育，应遵循人的自然行程，先是体格教育，使其有健康的体魄；然后以情欲的训练为主，养成其良好的习惯；最后才发达他们的理智，使其能过好闲暇的生活，从事于沉思，专心于学问。他说：“教育的目的及其作用，有如一般的艺术，原来就在效法自然，并对自然的任何缺漏加以殷勤的补缀而已。”^④在教育史上，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教育应“效法自然”的原理，而且把儿童和青少年的生理作为教育实施的依据之一。由于这一原理的提出及其运用，亚里士多德便把教育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三、体 育

七岁前的教育以体育为主，要及时地引导儿童做些适宜于肢体发育的各种活动。儿童自幼养成耐寒的习性，很有必要；儿童习惯于寒冷，不仅可以促进其体格健壮，而且也可为其长大成人后的从军入伍作准备。至于儿童的啼哭，则不必禁止，啼哭时扩张肺部，有助于身体的发育。五岁前不可教儿童任何功课，以免妨碍其身体的正常发育。五岁前的儿童主要活动是游戏和听故事。“儿童游戏要既不流于卑鄙，又不致劳累，也不内涵柔靡的情调。”故事应由负责儿童教育的官员作出精心的选择。游戏和所讲的故事，最好能与将来的工作相联系，是将来应从事的工作的简单模仿。儿童的环境对其性格的形成至关重要。不要使儿童听污秽的语言，一旦轻率地口出恶言，离恶行也就不远了。同样也不要允许他们看秽褻的图画或戏剧表演。人们对最初接触的事物往往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务使他隔离于任何下流事物，凡能引致邪恶和恶毒淫情的各种表

演都应加以慎防，勿令耳濡目染。”^⑤从五岁到七岁这个年龄时期，儿童可以旁观人们正在从事的他们将来将要从工作。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学制，要使儿童从七岁起便就学于“体育教师和竞技教师”。体育的任务是帮助身体健康和“增进战斗力量”。为使体育能够发挥其效用，应采取一种合适的方针。当时，有的希腊城邦以培养运动员的办法去训练儿童和少年身体。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方针，因为少年儿童过度的锻炼会留下恶果，儿童的体质经过长期的剧烈运动将受到损伤，一些在儿童期参赛而得到优异成绩者，到了成年仍能在竞技中得奖者至多只有二、三例而已。所以在十四岁以前，儿童的体育规程只能是一些“轻便体操”。同时，体育教师应训练儿童身体养成正常的习惯，竞技教师则只能教给儿童以轻巧的武艺，如弓箭、弹丸之类，使其初步得到军事技术的训练。亚里士多德不赞成斯巴达人所采取的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严酷训练的方针。斯巴达人用野蛮的措施培训儿童的勇敢的品德，其实这种方法是错误的，因为勇敢是与凶猛不同的。“凡属最凶猛的往往未必是真正的勇毅”，例如在兽类中，真正勇敢的如雄狮，其性情往往是比较温和的。那些以掠夺为能事的匪徒以及那些吃人生番，他们并无真正的勇敢和美德。只有那种能正视危难，临危不惧，威武不能屈的人才是真正勇敢的人。

四、品格教育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人所固有的特性。人的固有特性，不仅仅是行使其植物性的功能和动物性的功能。实现人的固有特性，就是要使人的各种天赋功能得到高度发挥。在人们灵魂中，理性灵魂也应使其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亚里士多德对于人的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的观点与柏拉图很不相同。柏拉图把非理性的心理功能如感情、欲望等，一概贬为“卑劣部分”，都应该用理性压制下去；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情感、欲望既然是人性中所固有的，就应使其得到满足。他认为，人的生活，务必使其内部所有各种天赋的职能都能得到满足，并且都能在理性的支配、领导下得到和协而充分的发展，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人之所以为人，也只有如此，人才能是一个有美德的人。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强调应使人心的非理性部分也得到发展，还因为只是理性并不能构成美德，因为理性是静观的，若不借助于热情、欲望，理性是绝不能引起任何实践活动的。因而只有在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中，美德才存在。当感情、欲望为理性所控制时，就产生美德。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情感、欲望的理论，比柏拉图前进了一步，它具有较多的真理性。一方面，他主张用理性来指导人的情感、欲望，一方面，又反对压抑儿童青少年的情感以及合理的意向。

所谓美德，按亚里士多德的原义是指“卓越的能力和性能。”因此，美德就是指实现人生目的所必需的一种品质；也可以说，人的各种固有的灵魂的功能得到完善的发展，就是美德。

美德有两种，一是道德方面的美德，一是理性方面的美德。

道德方面的美德是指人的“性格状况”而言，所谓“即使一个人本身好，又使他把自己的工作作好的那种性格状况。”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解释说，所谓性格状况，就是一种既避免不足也避免过多的中间状态，也就是“中庸之道”（mean），也就是说，一

个人的“性格状况”是否是道德的，就看他的品格是否符合中庸之道。他说，美德即中庸之道。他是这样论证这个命题的：为恶属于无限那个类，而善则属于有限那个类；失败可能有多种方式，而成功则只可能有一种方式；射不中容易，射中目标则很困难；为恶容易，为善则很困难，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过度和不足乃是恶行的特征性，而中庸则是美德的特性。^⑥因此，美德即中庸之道，美德是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项，例如，在莽撞与怯懦之间有勇敢，在吝啬与浪费之间有慷慨，在怕羞与无耻之间有谦虚，在放荡与麻木之间有节制，在虚荣与自卑之间有自尊，在滑稽与粗鄙之间有机智等等。此外，也有一些行为如妒忌、怨毒、偷盗、谋杀等，其本身就是恶，没有什么过与不及可言。所谓中庸之道，并不是一种主观任意性，而是一种理性选择，是一种性格状况。它并不是绝对的，它是因人因物因地而有所不同，“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事物，对适当的人，由适当的动机和以适当的方式来感觉这些感觉，就既是中间的，又是最好的，而这乃是美德所特具的。”^⑦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在某些方面，类似孔子的中庸之道，孔子认为过犹不及，过和不及都不好，适中为最好。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孔子，他们所说的中庸之道都不能归之为折衷主义。孔子鄙薄“乡原”，称那种任何人都不得罪的无是非的人是“德之贼”。亚里士多德主张用理性克制情欲，主张人应实践道德上的至善，并把它做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

既然道德上的美德是中庸之道，那么它又是如何产生的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它乃是习惯的结果。习惯是在做的当中形成的。有许多事通过实践才能得到它们的技艺，如人们由于从事建筑而成为建筑家等。在德行方面也是如此，我们由于行为公正而成为公正的人，由于遇事能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对待之，而成为勇敢的人。因而从小养成一种好的习惯是极其重要的，好的习惯与坏的习惯，造成人们之间很大的差别。习惯可以使人养成恶徒，但如能勉力从善，则可以使入改恶从善，立地成佛。

一个有德性的人，也是一个幸福的人。人生的目的，是要实现美德，求得至善，并不是追求快乐。我们不能以快乐为人生之目的，但也不规避快乐。快乐是德行的结果。有德行的人必然是快乐的人。例如对于饮食，既不饕餮，又不减食，惟求其适当有节。这种节制的美德，必然使入身心愉悦。“活动最完善时，最使人感到欢乐。”没有活动，不可能有欢乐；而欢乐又使生活更趋完善。理论与实践并不是一个东西，认识了的，不一定就能付诸行动。亚里士多德把善行提到重要地位。他继承了古代希腊社会尊重善行的优良传统，并把它提升到理论认识的高度，成为他教育学说的重要原理。

对于儿童的品德训练，具有重大作用的学科是音乐。音乐包含三种功能：娱乐、陶冶性情、涵养理智。音乐能使人解除疲乏，消除劳累。人在紧张的工作学习之后，听到悦耳的音乐就能使入的精神顿觉爽适，紧张的身心得以松弛，从而使入心情愉快，故音乐能起到娱乐身心的作用。音乐的娱乐作用不仅表现在祛除疲乏上，而且体现在修炼心智上，因为沉思本身就是愉快的，而音乐可以促进这种高尚的愉悦之感。音乐的另一种功能，即陶冶性情的功能是比较显著的。由于音乐可以陶冶性情，故它可以改变人的性格。音乐进入肺腑，动人心弦，甚至那些非音乐的声音都能使入为之心动，如哭号使人同情，欢笑使人娱悦。音乐之所以感人深邃，因为音乐的曲调和节奏直接地反映了性格

的真相，如愤怒与和顺的形象，勇毅与节制的形象，正义与坚忍的形象以及一切与此相反的形象等等。当这些表现形象的音乐进入我们的听觉时，就能激荡我们的灵魂，并使它发生变化。此外，乐调所表现的内容不同，性质不同，因而激起人的不同感受。“有些曲调使人情惨志郁；……另一些流于柔靡……另一种能令人神凝气和”，还有的音调“听者未及终阕，就感到热忱奋发，鼓舞兴起了。”音乐既然能影响到灵魂的各部分，那么它作为儿童应学习的基础课程，也就十分必要了，况且音乐也很适合儿童的性情和需要。

音乐与体育课程一样，必须遵循合适的原则，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首先，音乐教育以培养德行为主，因此所选之乐调应该是有助于培养品德的乐调。不要让学生学习和演奏那些鄙俗和败德的作品。其次，在音乐的教育中，可以让儿童登场演奏，但以培养其鉴别力为目的。儿童登场演奏，可以熟练其技巧，增长其对别人演奏的评判能力。等到他们业已养成欣赏和评判音乐的能力时，就不应该再登场表演了。这是为了避免儿童养成职业乐工的习惯。乐工们公开演奏或参加竞赛，为了取悦于观众，便追求鄙陋的曲调，他们经常演奏那些下品的东西，自己也养成了卑俗的性格。所以音乐教育应摒弃专业训练的方式，音乐教育不是为了培养职业乐工，不是为了公开演奏，而是为了培养德性，涵养心灵。

绘画这门课程，按其性质讲，也可以表现人物的性格，但它不如音乐深刻，它所反映的性格是“狭小而肤浅”的。它所表现的是处于某种情感中的人物，通过描绘人物所处的情感状况而反映人物的性格。绘画既然能够间接地显示人物的性格，因此也有教育意义。在进行绘画教育时，要引导学生研究那些善于摹拟道德情操的作品，而不要去研究那些歪僻放侈的作品。绘画课的目的，是培养儿童对于“物体和形象的审美观念和鉴别的能力。”

品格教育是属于人的灵魂中的情感、欲望等部分的培养问题，是训练人如何用理性去抑制情感、欲望，又同时使人的感情、欲望得到合理的发挥，从而使人具有好的品格，具有实践方面的美德，使人的行为能合乎中庸之道的要求。

五、理性教育

智力教育的对象是人的理性灵魂。人的理性灵魂的功能是沉思。因此亚里士多德又把沉思当作理智活动的美德，沉思是纯理性活动，是探索真理，考究哲学，研究科学的最好的活动。沉思之所以是最好的活动，因为理性是人的最好东西，理性的对象是人们认识的对象中最好的东西。另外沉思还具有连续性的别点。人们在沉思中可以持续地思考真理。因而人们可以在持续地沉思活动中，充分地领悟人生的幸福，而幸福又总是有愉悦之感的。

沉思活动，需要充分的闲暇。闲暇并非无所事事，并非游嬉。游嬉是繁忙之后的憩息，它是与繁忙相联系的；闲暇则与沉思相联系。人应该有所作为，有为的生活乃是高尚的生活。沉思的活动也是一种有为的活动，它本身就有较高的严肃的价值。人要繁忙，没有繁忙，没有辛苦劳累，就不可能有闲暇。忙碌的目的是闲暇，正如战争的目的是和平一样，忙碌、勤奋是必须的，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是需要的，也是可贵而伟大

的,但它们比沉思稍逊一等。因为政治和军事活动,辛勤而繁忙,而且它们都是为了一个目标的,因此这些活动也必然使人的灵魂从属于外物,所以它们不如沉思活动高尚。反之,沉思活动是以思想本身为目的的,是为了思想而思想,它只限于自身,而不外向它物,因而它是自由的,它不因外物而使自已处于屈从的地位。纯思维活动是人所特有的,“每一种东西所特有的,对于那种东西就自然是最好的和最愉快的。因此,对于人,符合于理性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和最愉快的,因此理性比任何其它的东西更加是人,因此这种生活也是最幸福的。”^③

亚里士多德把纯思维活动看得比政治活动还要高尚还要重要,正说明他与苏格拉底、柏拉图都是理智论者。他们认为概念先于事物,一般先于个别。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都是先于个别事物的东西,都属于第一性的本体。而“理念”、“形式”都是思维的对象,因此便认为纯思维活动高于政治活动。我们极其珍视亚里士多德赋予思维活动在认识中的崇高地位,同时,我们也应抛弃他的贬低实践活动包括政治实践的形而上学的观点。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亚里士多德在教育问题上,重视练习重视实践的积极意义。上面已经论述亚里士多德主张以练习培养德行,以沉思培养心智,使道德与理智都趋于完善。在培养人的美德中,他既重视实践,又重视理论,因而他的道德教育比苏格拉底、柏拉图前进了许多。苏格拉底认为道德完全是认识的问题,不是练习所能得到的,亚里士多德则主张要使人的各种心理功能都得到练习的机会,习之既久,就成为人的第二天性,因而也就成为美德。与此同时,更要使灵魂的纯理性部分得到发展,通过听高尚的音乐,读优雅的诗,研究学术以及沉思哲理,人生凭藉这些“有为”的活动来陶冶性情,成为善人。所谓善人就是能够充分地发挥出他的天赋的各种功能,从而具有美德的人。这样的人有理想,有崇高的生活目的,善于辨认真理,行动适中得体。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既包括理性上的美德,所以这种美德必须通过教育才能得到。

总之,亚里士多德在教育理论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果说,柏拉图创造并奠定了西欧教育学的理论基础,那么亚里士多德则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理论基础,从而使古希腊教育理论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亚里士多德的评价非常之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称他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在他的思想中随时可以找到辨法的痕迹。他继承先辈的思想,但又不拘泥于先行者们的成就。他吸收了柏拉图的许多证思想,但对柏拉图学说中的许多观点又持否定态度。他曾公开宣称: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正是这种精神,使他有可能创立出具有更高水平的教育理论。

注释:

- ①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转引自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339页。
- ② 列宁:《哲学笔记》第293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 ③、⑥、⑦、⑧ 北京大学:《古希腊罗马哲学》281;321;328。
- ④、⑤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七,第七章。